

紅山文化有玉蠶嗎？

郭大順

五千多年前，住在遼河一帶的紅山文化居民，觀察桑樹上的蠶寶寶，瞭解了蠶的生活史，由卵孵化為幼蟲，幼蟲吐絲作繭，到破繭成蛾，又大量產卵。週而復始，生命永無休止。

紅山先民，感受蠶兒神秘的生機，就用瑩秀溫潤的美玉，雕琢蠶寶寶的形象。

今天的人們很少真正觀察自然界的生物，於是四件精緻美麗的玉器，就掀起了是蠶？似蟬？的熱烈討論。

有關紅山文化玉蠶的材料，報導不在少數，不過有明確出土地點從而最有代表性的，還應首推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採集的四件標本。一九八七年發表的〈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以下簡稱〈調查簡報〉）文中報導了這四件標本，〈調查簡報〉對實物的描寫較細而樸實，有助於對這幾件玉器細部的瞭解，特予引用。〈調查簡報〉說，這四件玉蠶「可分為兩式，I式，二件，形制相同，圓柱體。前端較粗。頭部中間浮雕兩個圓眼，兩眼間有一凸線，上緣為額頭陰刻狀紋，邊下緣沿施兩個小乳狀突；頸背部刻出（弧）形凸

線紋，腰背

部橫刻兩道

凸紋；尾端向

背部翹起，腹部素面

無紋；兩側對穿一透孔，刻工

精緻，形象逼真，長七·八、徑

三·三公分。II式，二件。比I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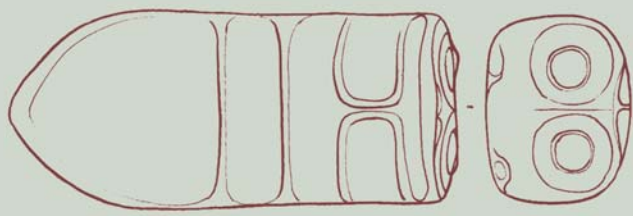
稍大。頭部額部陰刻「八」字形紋飾，兩圓眼間

有一鑽孔直通尾端，腰部亦有一橫向鑽孔同縱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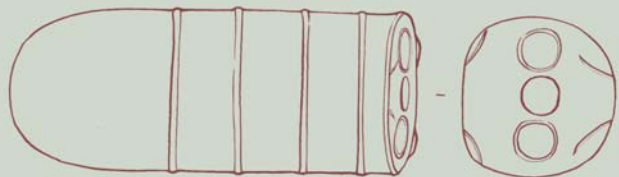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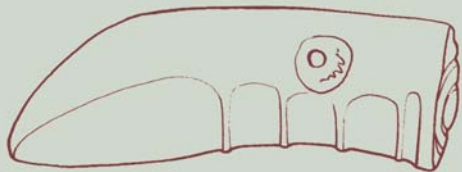
鑽孔交叉，背部有四道凸弦紋，尾端腹面陰刻一

彎月形溝痕，長九·九、徑三·八公分。」（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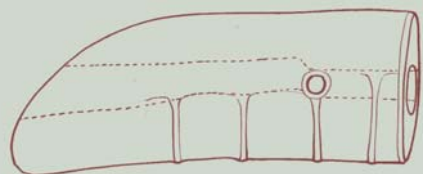




圖一之一 《考古》
1987,6稱為「I式
玉蠶」共有二件



圖一之二 《考古》
1987,6稱為「II式
玉蠶」共有二件



圖二 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 玉蠶 內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玉蠶錯置，腹部朝上了）
《中國美術全集》中稱之為「玉蟬」

但此後在引用這幾件玉器材料時，卻出現不同觀點。一九八四年這四件標本中的二件，參加了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全國出土文物珍品展》，該展覽文字說明中，稱這二件標本為「黃玉蟬」，並說「此器原稱蠶，似不妥，應稱蟬為宜」；《中國美術全集》也定為「玉蟬」，（圖二）並在圖版

說明中稱：「蟬體飾紋簡練，身軀肥壯，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蟬。原報告稱為『蠶』，似不確切」。此後傾向於那斯台遺址這幾件標本為蟬的較多，或有稱為蟬蛹的，也有延續〈調查簡報〉的觀點，以為是蠶的。

那麼，這四件玉器到底是蠶還是蟬呢？

一九九四年，我陪香港玉器收藏家何鴻卿先生、牛津大學墨頓學院院長羅森博士和香港敏求精舍會長鍾華培先生到內蒙古赤峰市考察史前玉器，有幸在巴林右旗博物館親手觀摩了這四件玉器中的兩件。感覺這兩件玉器除了都用料講究，製作精細，造型規整，個體較大，身體各部位都有明確的交代以外，驚奇地發覺，這兩件玉器的前端緊靠長側的一邊，都特意刻出兩個短乳突，這兩個乳突，雖甚短小如圓突尖，卻明確無誤，它們高度相等，左右對稱，琢磨工藝很有難度，顯然是特意而為的，這就是〈調查簡報〉中稱之為「邊下緣沿施兩個小乳狀突」的。然而，在頭部的下緣特意雕出這對稱的雙乳突表示什麼部位呢？有以為是蠶的足，仔細觀察，這雙乳突的位置其實不是刻在頭部的邊緣，而是刻在面部，在面部緊靠長側的邊緣，是從面部向前伸的，故應與足無關。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兩個短乳突所在的長側一邊作為頭部的上緣，那就會有一個可信服的解釋了，即這兩個左右對稱的短乳突就是頭上端的兩個觸角。以此為定位來看整個玉件，則對其整體形象會有一個嶄新的認識：以I式為例，觸角之下的頭部端面上，以兩圈陰線雕出的雙眼，其位置在端面略偏向下方，以下接近邊緣的〈調查簡報〉稱為「陰刻狀紋」的，其

實正好是嘴巴，且微張似作吐物狀，極為形象（圖三之一）；身軀則不是向上卷，而是向下彎曲，這樣，身體所飾的分節紋恰在身體下方的腹部。II式體態特徵與I式基本相同，唯嘴巴簡化為「八字形。為此我與巴林右旗博物館的諸位同行交換意見，他們也有同感，認為在發表調查簡報時正好把上、下兩面說顛倒了。但他們仍堅持是蠶而不是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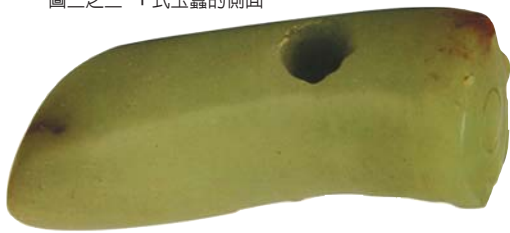
圖三之一 I式玉蠶的正面



圖三之二 I式玉蠶的腹部（請參考圖一之一）

為了確定此類玉器的原型，我又特別注意到，在I式標本的身體下方第二個節內，特意淺雕出一對回字形凸線紋，刻紋十分規整，左右完全對稱，即〈調查簡報〉中描寫的「頸背部刻出（弧）形凸線紋」，（圖三之二）引用此標本的有已注意到這一特殊紋飾，有稱之為「相背的弧凸弦紋」（註五）。它們是表示什麼部位的？看來這是確認此

圖三之三 | 式玉蠶的側面



類玉器原型的又一個關鍵所在。為此我特地到瀋陽農業大學請教了蠶學專家並觀摩了該校的蠶、蠶蛹和蟬的標本，得知蠶在變飛蛾前的蠶蛹，其近似於長橢圓形的雙翼是貼到身體下部的，從而將身體腹部前端的多個分節掩蔽，只有腹部後端的三個分節露在外面可以看到，這正與那斯台遺址所出的標本相同或相近，即此器身體下方第二節內的對稱回字形紋，是表現蠶蛹的雙翼的！這雙翼的下邊正好還有三個分節。由此可以確認，這幾件標本是蠶蛹，而非蠶本身，更非蟬或蟬蛹。

至於I、II式體側中部都有橫穿的單孔，則很可能就是蠶身體兩側的排氣孔的簡化或象徵性表現（圖三(III)）。

其實，已有研究者對這幾件標本的這些細部特徵進行了重新認識，如二〇〇四年《紅山玉器》一書，在對這幾件標本拍照、繪圖時，仍延續〈調查簡報〉的線圖，是將標本的身體倒置的，不過在說明文字中已提到I、II式玉蠶都有「觸角」和「翼翅」，並指I式「蠶的前部靠頭眼部分，是琢磨出的兩個長半圓形的隱地凸起的蠶翼紋」，但又稱I式嘴巴的刻劃線為翼翅，邊緣兩個乳突則稱為足，II式陰刻八字紋嘴巴也稱為足，出現這類稱呼不一

致的情況，可能仍然是未將蠶體的正反完全搞清楚緣故，故都還有可商榷改正之處。

中國新石器時代之有蠶，已有多例。最著名的，如一九二八年李濟先生在山西省永濟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一個半割的蠶繭（圖四），現藏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還有本世紀六〇年代在河北省曲陽縣南陽莊仰韶文化遺址所出的陶製蠶。近年，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也都有蠶的形象發現。



圖四 西陰村出土半個蠶繭 長約1.36，寬約1.0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良渚文化 蠶紋陶罐
高13.5，腹徑12.8公分
江蘇吳江縣梅堰出土



其中河姆渡遺址第四層象牙雕杖端首的刻劃蠶紋為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蠶的形象（圖五）。江蘇吳江梅堰良渚文化遺址陶罐上也飾有蠶紋（圖六）。南陽莊仰韶文化陶

製蠶已被鑒定為家蠶。尤為

難得的是，在浙江省吳興縣錢山

漾良渚文化早期地層裡一次就

出土了絲線、絲帶和絹片共

三種絲織品。其中的絹片用

平紋織法，密度已與近代

絲織物相近。河南省青台

仰韶文化晚期甕棺墓也發

現過絲織品。以上考古發

現都可證明，我國大約在新

石器時代中期起，就已對蠶

有所認識並開始育化進而繅絲

紡織。紅山文化玉蠶的確認，又

將史前育蠶史擴大到燕山以北的遼

西地區。

不過，有研究者以為，最早養蠶並不為吐絲織絲製作衣服，而是一種屬於精神生活範疇的現象。這以牟永抗、吳汝祚二位先生的論述最為明確。他們以為，古人育蠶的動機，與獲取食物的農業、畜



圖六之一 良渚文化
蠶紋陶罐底部

牧業不一樣，即不是為了解決一般人們禦寒掩體的需要。他們以與蠶生命演化過程相近的蟬作為佐證，石家河文化有大量玉蟬，商周青銅器上更

以蟬為主要紋飾，可知蟬很早就

進入人們的精神生活，成為

人神交往的媒介，「蟬蛻」

更是人們希望死者的靈魂

有如蟬之蛻而永生。蠶與

蟬的生命史相同，從靜態

的卵、蛹的體形變化，到

蠕動、飛翔的幼蟲、蛾

的兩次動態變化，所體

現的生命的循環，都不

能不蒙上神秘的色彩。

而蠶吐絲作的繭，是這一

系列變化賴以生存的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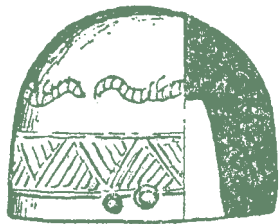
環境，也具有同樣的神秘含

義。據此，牟、吳二位先生以

為，古人育蠶的初意是在人與

神、人與天溝通有關的占卜上。就是發

展到以繭織絲，也具相近含義，因為從繭中抽出纖細的絲並織成輕薄又柔軟的織品的織絲過程，是一套相當精細的系列工程，根本不是一般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牟吳二先生推測最早的絲織品有兩種功



圖五 河姆渡文化象牙雕杖首刻劃的蠶紋
(取材自《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1979)

桑之業，與農業生產一樣，亦為一年的重

禮十分隆重，又每於蠶神求年，知蠶

示或用三牛，或與三宰，或用羌，典

神

卜辭提到了祭「蠶示」即蠶

甲以至稟辛、康丁三個時期有四條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祭蠶神的記錄。胡厚宣先生曾著文指出武丁和祖庚、祖

方面考證：

孫守道先生也曾大量引文，對蠶的神化作過多

術有關。

能，一是用絲織品記錄文字，是記錄人與神交往的視覺資訊內容的，其出現應早於甲骨文，「卷」

要收成。」

此後這方面的記載不斷，如：《荀子》：蠶

「屢化為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淮南子》

注引漢佚《蠶書》之語：「蠶為龍精」。鄭注《周

禮·馬質》也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

種」。《後漢書·禮儀志》：「祠先蠶以少牢」下

注：「漢舊儀曰，今蠶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

二神」。

還多將育蠶及蠶的神化與黃帝的事跡相聯繫，

如：《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時「淳化鳥獸蟲

蛾」，淳化即馴化，應就包括養蠶的內容在內。《南

齊書·明帝本紀》記載建武二年詔書云：「蠶實生

本，教重軒經」，軒即軒轅氏。

另有黃帝妃螺祖為蠶神的記載，雖是後出，也

是時代的反映，如：《隋書·禮志》記載「後齊每

歲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娘丘太宰禮先蠶黃帝軒轅氏

於壇上。」《周書》記載北周時「皇后至蠶所，以一

太牢新祭，進尊先蠶西陵氏神。」《通鑑彙前編》記載

「黃帝有熊氏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育蠶起源的背景及其神化，在史前考古中發現

的諸多蠶的資料中都或多或少有所透露。西陰村仰

韶文化地層中所出蠶繭作半割狀，最能說明其尚未

用以繅絲而是作其他非實用的用途如占卜的，仿蠶



圖八之一 II式玉蠶的正面



圖八之二 II式玉蠶的尾端



圖八之三 II式玉蠶的腹部（請參考圖一之二）



圖七之一 第二件I式玉蠶的正面



圖七之二 第二件I式玉蠶的腹部



圖七之三 第二件I式玉蠶的背面（請參考圖一之一）

的陶蛹和用蠶作特殊器物如象牙杖首上的裝飾花紋，都可能與對蠶的特殊神秘性認識有關。然而，紅山文化的玉蠶蛹，則是蠶被神化的最有力的證

則不見這一部位的表现。I式的穿孔，只在體側穿一單孔，II式則除體側穿單孔外，還從頭到尾，通體豎穿一大孔。（圖七、八）這些區別似也有一定的規

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四件蠶蛹的觸角和眼睛、嘴巴，與蠶蛹的原型並非完全相同，而是或加以突出誇大，如眼睛與嘴部；或予以簡化，如觸角與排氣孔；或加以變形，如雙翅翼；就是體形，也可能有放大或加寬的可能。顯然，這樣的處理手法，都與對動物的神化有關，這是紅山文化在製作動物形象時，常用的共同藝術構思，也是紅山人以動物作為通神工具的又一例證。更為有趣的是，這四件標本各為一對，即所分的I式和II式，它們之間體態特徵，大同小異，最大的區別，一在嘴巴，一在有無雙翼，一在穿孔。I式的嘴巴作吐物狀，II式的八字嘴，用簡單的刻線表示，顯示的是嘴巴關閉的神態。I式有刻紋講究規整而變形的雙翼，II式

據。這可以從那斯台這幾件標本各個關鍵部位和體態特徵的重新認識中看出。

律性和特定的含義。可以推測，古人對蠶的由蟲變蛹再變蛾這種生命返復現象，既然有一種神秘感並賦予其溝通人神天地的功能，對其演化過程的觀察也必然很細微的，而蠶生命演化過程中由蠶變蛹這一最關鍵的環節，正是在吐絲作繭過程中完成的，這也是古人最感神秘的自然現象，也許紅山人正是抓住了這一環節甚至一瞬間，將蠶正在吐絲和完成吐絲的同時，由蠶變蛹的狀態分別予以表現，才製作出這樣總體神化、細部特徵突出的玉器精品。藝術源於實踐，又在通神禮儀中產生出高於實踐的作品，五千年前人們與大自然的融為一體並從中取得的靈感與智慧，令今人無限神往，又無比崇敬。

更為重要的還有玉與帛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史前以玉器為巫者寶衣上專用，是兩者結合用以通神之意；此後的記載更將「玉帛」相連，作為禮制的最高載體之一，有時甚至作為禮器的代名詞。《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最好的說明。這裡與玉一起所貢獻的帛，可能就是有文字記錄的帛書之類。玉器的使用與絲織品相配，是自古以來就是作為崇高、和諧的象徵物來對待的。在通神時用玉與帛衣，或作為會盟活動的主體內容，都是取其和諧溝通之意，正所謂「化千戈為玉帛」。

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造型及其高度規範

化、玉類的組合及埋葬的嚴格等級，說明玉器是最早的禮器，而禮的最初形成是與史前人類的以玉通神密切不可分的。劉師培說「禮源於俗」，就是以為禮最初源於民間通神的巫術。紅山文化以玉為蠶，有將玉與帛合為一體的寓意，其所具有的「通神為禮」的功能就更為明確和成熟。所以，那斯台採集的這四件紅山文化玉蠶蛹，不僅是紅山文化玉器中的極品，而且還可從中挖掘出中華傳統文化中一些更為深邃的含義。

參考書目

1. 巴林右旗博物館，〈內蒙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考古》，一九八七年八期。
2. 文化部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編，《全國出土文物珍品選》，圖九十四及圖版說明。
3.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篇·九·玉器》，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4. 于建設主編，《紅山玉器》，遠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5.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
6. 張光遠，《談殷商帝王文物及五十年前蠶蛹在故宮——中國考古先鋒李濟博士百年誕辰紀念》，《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三卷五期，一九九五年。
7. 唐雲明，〈我國育蠶織綢起源初探〉，《農業考古》，一九八五年二期。
8. 牟永抗、吳汝祚，〈水稻、蠶絲和玉器——中華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考古》，一九九二年八期。
9. 孫守道，〈紅山文化「玉蠶神」考〉，《中國文物世界》，一九九七年五月號。
10. 李澤厚，《己卯五說》，中國電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歷史本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二年。